



封面设计：黄 蓉
封面题字：李锐可

新会文史资料选辑

1984年第2辑

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

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

目 录

抗战前后会城的小学教育……………李达生（1）

抗战前后的新会县民众教育馆

……………何季镗（13）

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前前后后

情况的回忆（五）……………谢 悦（22）

抗战初期会城的“青青社”

……………陈仲衡 何达云整理（28）

旅古见闻点滴……………陈孙悦（32）

近代会城各间武馆组织的概况

……………赵拱卿（39）

施见三老师二三事……………伦海滨（43）

回忆爱国民主教育家施见三老师

……………何坤巽（51）

圭峰旧游杂忆……………李云谷（53）

抗战前后会城的小学教育

李达生

一、抗战前后会城小学教育概略

新会的文化教育事业，向来是较为发达的。会城镇抗战前几年就有县立小学七间（县立一小、二小、三小、四小、六小、十小、师范附小），私立小学将达50间。计有平山、文懿、瑞成、象泉、城东、善培、南洋、伟武、俊伟、江南、冈秀、薰尧、环溪、时中、古冈、永思、明智、广智、育才、永存、澄波、蔚霞、惠吾、有元、光华、华英、殷浦、崇真、达人、公余、廷芳、西墩、互助、植英、精英、慎阅、德新、宏才、文化、平民、文华、蕴华、祚祥、文澜、诵芬、泽仁、新民学园，区一女小，还有鹤鸣国民专修学校，和专教珠算的习成堂等，分布于城里城外，仅五显冲两岸就有小学六七间之多，真是学校林立。

抗日战争的炮火到达会城，六间县立小学和私立平山小学都在事前疏散到农村；二小在崖西京背，三小在双水塔岭，四小在司前石步、五小在牛湾六堡、六小在罗坑笋岭、十小和平山同在双水上凌，其他小学多随着江会沦陷而停办。在日敌统治下继续上课，执行汉奸奴化教育的是极少数。

抗战后期，一九四三年一月各县立小学奉命改制称为乡中心国民学校，我县原迁农村的六间小学一切校具设备都已移交所在地乡公所接办，胜利后会城的公立小学，是接收沦陷期间日伪小学开办、计有会城镇中心国民学校一间（在金紫街，现人民医院址，校长冯铁梅），和保国民学校四间，四八年以教育经费不足为理由，缩减为三间，第一保校在（五

显冲，现创新中学校址，校长何伯钊）、第二保校（在募兴路，现时代服装厂址，校长黎世泉）、第三保校在（镇前路现镇人民政府，校长何荣汉）。

私立小学先后复办和创办的有：平山（校长李钦）、文懿（在尚书坊，现实验小学校址，校长何国琮）、葵风（在知政中路现东方红中学校址，校长陈丽荷）、象泉（在南宁街、现实验幼儿园园址，校长莫仲琳）、瑞成（在景行里，现粮局宿舍大楼，校长李仪可）、侨光（在爵芳巷现东方红校址，校长陈柏坚）、崇真在（东门市现朝阳小学校址、校长莫荣坊）、殷浦（在古榕台，现南宁幼儿园附近，校长林殷浦）、广智（在五显冲，现创新中学右侧课室，校长刘伯皋）达人（在凤池里，现新民小学校址，校长陈嘉荣）、祚祥（在金紫街冯公祠内，校长冯天祥）、植英在（金刚地，现电机厂地方，校长谭惠）、精英（在炒米街，现敬老院址，校长钟宝瑜）德新（在民生路，现机关幼儿园、校长练德和）、致用（在西隅路，现会城副食批发部，校长黎昌）、崇实（在诗书街，校长林日章）、青年（在深冲桥，现县招待所址，校长钟宇宋），群英（在环溪庙，校长梁永年），仁义（在金刚地，现医疗器械厂，校长钟载贤）、励志在如求社，校长陈国材、新生（在环堂里，校长罗吉谋）、培新（在东澜里、校长梁鹤畴）、华英（在河南路，校长王东荫）、坤德（在骑虎关、校长谢秉桃）等20多间。

据四九年一月前新会县政府公布全县（包括江门）小学教育情况：有中心国民学校116间，学生30011人，保国民学校263间，学生26971人，幼稚园4间，幼稚生280人，民众学校3间，学生264人。私立小学28间，学生6617人。

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提出一保一校的口号。新会全县有

1211个保，到四九年保国民学校只得263间。会城镇是县治所在地，文化教育的中心，全镇划分16个保，而保国民学校也仅得三间。从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所谓发展公办教育事业的政绩了。

会城私立小学在数量上比抗战前减少，有的在质量上相当好，在培育人材，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，被会城人民所称赞。私立学校经费的来源可分为五类：①华侨捐资开办的有平山、侨光；②姓氏封建祖尝兴办的有何姓的文懿、莫姓的象泉、李姓的瑞成等；③中华基督教会办的有崇真；④中共地下组织联系教育知名人士集资创办的有葵风，它们都有一定的办学经费，教学设备，师资素质也较好。⑤还有一些独资或合伙以办学为生计的所谓“学店”。

四八年十二月间广东省教育厅督学冯少杜来新会视察，由县督学张明晖陪同先后到会城葵风，文懿，平山三间私立小学，和镇中心学校及一、二、三保校视察后说：“新会教育事业尚称蓬荪”这句话，就是当时官方下的结论，表示满意了！

二、公立小学官场化私立小学商业化

抗战胜利后我县公立学校受县政局人事变迁的影响，特别严重的，县长更换，校长也随着下台。校长更换，教师非有特殊关系，很少能继续留任。所谓清高的教育部门，也是一朝官府一朝臣。如会城镇中心国民学校，在胜利后四年多的时间就更换了五位校长，先后有莫景耀（后台是莫朝英和英朝雄），蒋惠浦（县长汤灿华指派）、莫国宝（会城镇长兼），何汝倬（会城镇长兼）、冯铁梅（国民党县党部监察

委员及县参议员)。至如保国民学校的校长，也没有一个能连任几年的。因而公立学校的校长也视学校为他个人混入官场的前进阵地，在教师方面，为了撑持门面，不能不拼凑几个较有学历的亲友来点缀外，其余的不是某某官长的姨太太，就是某某大绅的亲亲戚戚了。不管什么资历，随时可以编造上报。教师中便各有各的后台，互相排挤攻击，学校变成钩心斗角的政治场所。上课照本宣科，下课后饮茶打牌，校长为了保住乌纱帽，还要送几个名额孝敬教育科长和督学，所以公立学校教师实际人数与编制是不相等的，把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在几个教师身上。

会城镇如此，农村也不例外，虽然没有某某官长介绍他姨太太下乡教书，但校长多数是由乡保长兼任，每逢更换乡保长，都影响到教师的去留和教育经费的清发。当时整个社会情况如此，做教师的人那有几个能够专心教学呢！

在私立学校方面：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规定，凡要开办学校要有适当校产，教学设备，校董会人员的名单及教职员履历等要列表报请县政府，经教育主管部门派员调查核实才批准开办的。但在人情大过天，财可通神的旧社会，找个社会名流，地方士绅做校董或校长，和有关方面应酬一番，就是没有什么校产没有什么教学设备，只租赁一间祠堂和购置一些学生桌椅、黑板等，也可以挂起招牌招生了。如西隅路的致用小学挂名校长黎昌，是城南乡长、参议员，城南一霸，与学校毫不沾边。开办学校成了光复后新的生意门路，因而有独资和合股开办等形式，校长是老板，教员是股东或伙计，学生成了顾客，所以人们称之为“学店”。当时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出现呢？就是因为那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出路困难，有的没有什么适当的工作可做，但又不想坐在家里吃闲

饭的，于是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起“学店”来。

这些以独资或合股开办的私立学校，在数量上是比那有经费来源的多得多，因它全靠收学费、杂费来维持，就要千方百计使学生人数多，自然也要讲究招徕术，竞争招生。当每个学期招生开始，便大登广告，遍贴街招，派出教员对家有学龄儿童的亲友上门拜访，拉关系，讲交情，邀请将他们的子女报名入学，甚至可以降价以求。对学生的学业不敢严加约束，怕得罪学生，失掉顾客。

另方面那些老牌的私立学校，也各有一套招徕学生的方式。有的工于装饰门面，注重形式，图表满壁。适当时期搞些学生成绩展览会或某种活动，邀请学生家长及街坊人士参观，吸引家长们对学校的信任。有的专以搞好学生队伍游行行列，遇事大出风头，使官场上和群众们感到该校纪律好。如崇实小学校长林日章是很典型的，每逢节日游行，或长官上下任，他必定亲率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，高举校旗，打鼓鸣号，吹哨操步，环绕会城主要街道一周，有时遇雨也是坚持的，林本人是擅长打铜鼓，吹乐号，设备鼓乐比其它学校多，经常以此训练学生做招徕的活广告。又有的为迎合有些家长要求严格教育自己子女的心理。本着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的古训对学生一味施行严格管教，认为儿童无自立能力，必须进行强迫学习，不讲儿童心理，因材施教，启发学生主动学习。以考试压学生，要默写背诵，对懒惰顽皮的甚至实行体罚，学生有的消极反抗逃学，有的暗中戏弄老师。当时报纸就有文章抨击，结果仍是取用这些方法。有位教学十多年的谭老师曾公开对人们说：“若是不打学生就不算是好老师”。事实上那时社会有的家长是赞同这种管教方法，它有它的市场。又有一种如殷浦学校，不设初小专收五年级

以上的学生，收费也较高。吸收的学生是以从事小工商业及华侨子弟为对象，迎合那些希望子弟在成年以前，能学得写好几个字，会写信，会记账便出来谋生或等候机会出国的父兄心理。学课也着重教古文、珠算、习字以及一些史地常识。同时也取用严格管教的教学方法。该校的学生人数不少，它是以老招牌取胜的。

私立学校由于一切开支，都是靠学费、杂费收入，少用一分钱就是校长多赚一分钱，势必形成商业化，学生返学校就是上课，做习作，什么课外活动，图书仪器、体育设备等都没有。华英小学把几个班级几十个学生集中在一个课室内，除了上课就是放学，连个活动场所也没有。那时如果设有乒乓球台、几本图书、简陋排球场，算是一流的了！

三、经济贫困 生活动荡 政治迫害

抗战胜利，并未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，接着而来的是银纸贬值，物价飞涨。教师待遇微薄，生活直接受到威胁。为求得生活安定，也向政府效尤征收实物，出现了“以米代薪”的办法，将学费改收学米。学米的起源于抗战期间，由于粮食恐慌，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，在不使教师挨饿的诚意下，送些米给老师，初名敬师米。胜利后先在公立小学由借学米进而征收学米，后来推行到中学。一九四六年广东省视导团黄范一来新会视察时，认为教师待遇微薄，允许各校征收学米，这就成为合法的制度了，连向来免费的师范，农商职业学校也征收学米。私立小学也同样照收了。

征收学米数量不统一，公立小学低年级30司斤，高年级40司斤，私立小学较高些，杂费也是以学米计算的。这就给学生家长加重负担，社会议论纷纷，因此所谓民意机关新会

县参议会，在四八年三月第四次会议作出决定：①确定私立小学征收学米每学期不得超过60司斤，教师米津不得少于200司斤（高中收学米140司斤，杂费35司斤；初中学米120司斤，杂费30司斤；农职及简师40司斤，杂费30司斤）。②严禁学校滥收杂费；③统筹乡保学校经费事项交县政府执行。但官场积习，总是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，行而不实，故参议会此案，仅是一纸空文。

私立学校收学米总是比公立高些，一般家长多愿送子女入公立小学，但学额有限。当时保国民学校教师月领150司斤，校长190司斤，中心国民学校略高些。私立小学待遇较公立高，一般是200—400司斤，较优厚的达到600多司斤。公立小学经常闹欠薪，会城镇国民学校四八年一二期各校经费还未有解决，四九年又欠薪达2—4月。各校征收的学米只能够分发三四个月教师的工资和支付杂费。到四九年七月镇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，才将发霉的稻谷2700多司斤平均分发给各保校，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。

经费是教育事业的命脉。会城镇办学经费的校产有田500多亩，铺业四间，庙宇八、九所（投承收入）每月收入是不少的，统归会城镇教费管委会支配，而使教师枵腹从公，是令人费解的。那时外海中心学校教师曾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清发欠薪，如不解决将停课待命，可见城乡公立小学教师的命运也同一样。会城有的私校如平山、文懿、象泉等校有祖尝田亩或铺租收入做校产，经费充裕、设备也较完备，待遇较好，聘请教师要求较高，教师们总想托人拉关系挤进去，所以那时有句笑话，学生“走公”，教师“找私”了。

在旧社会当教师虽然这么清苦，但那时要找份当教师的职业也不容易，每年寒假和暑假，是教师的两个难关，聘请

教师通常是半年（一学期），也有一年的。若在寒暑假前接不到关书（聘约），或学校当局没有口头通知，下学期就接近失业的边缘了。寒暑假是教师们苦恼的日子，整天为下学期吃饭问题而彷徨焦急。

大南路的大众茶室，是教师的职业介绍所，农村请教师到这里找人搭线，被聘请做主任或教师的也去那里找“拍挡”。那时城市难找职业，农村也不容易。每年教师来源都有增加：①因经济困难而停学的大中学生，找职业多向当教师这条路走；②机关被裁人员，一般是知识分子，做生意无本钱，干坏事无胆量，也只有走教师这条路；③没有能力升学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，又挤到教师队伍中来。因而教师经常处于粥少僧多状态，没有人事关系难找到一份职业，就是领有甲种登记证，又有十多年教龄也不容易找到吃饭的位置。社会上曾出现缴墙脚，顶烂市，抢饭碗，索取介绍费（有的预付一月工资，有的讲明数字按月缴交）等情况。教师待遇现已微薄就更加微薄了。

但新会教育局，却借甄别小学教师的质素的名目，举办过两次全县小学教师登记，作为发财的机会。较严重的一次是抗战前的陈济棠时代。按规定要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，或初中毕业要有三年以上教龄才能合格当教师，领取正教员登记证。未满三年教龄的只能领代教员登记证，待遇较低，没有登记证的不得聘用。为了取得合法的资格，教师想方设法托人借，拉关系向有关学校要求填写聘书。而通过教育局这一关却不容易，但财可通神，教育局有计划大开方便之门，县督学赵××等人（姓名忘记），和会城几间小学有默契，如有元代人“伪造关书”等校，若持有该校的聘书，加上两三个“电光炮”（白银10元卷起来等于电光炮这样大），

就可以领到正教员的登记证了。

经过这次的甄别登记，全县小学教师大多数是正教员，教育局的“收获”也不少，所谓清水衙门的教育局也有油水捞。我是乡村师范毕业，初次当教师是教育局长陈恒业的侄陈子明介绍，没有使用“电光炮”，可是逢年过节送礼孝敬是免不了的。

第二次教师甄别登记约是在一九四〇年，那时县府半壁河山，政令能达到的只有几个区，要找人来登记也难。笔者那时不要再登记，没有听到什么敲竹杠事的传说。

女子当教师更困难些，一间完全小学只有二三名女的，农村小学会更少些。不论女的学历资历怎样，总是同工不同酬，待遇是低于男性，也只能教低年级。还有不少苛刻的条件，如结婚的不要，有婴儿的不要，产假要自己找人代课等，什么男女平等，只不过是句空话而已。

在城镇当教师，会多受一层政治迫害，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进攻阶段，国民党加紧了法西斯统治，魔爪伸向教师，规定做教师的要有文官荐任以上（县长级），武官校官以上（营长级）的人来担保，试想教师怎能找到这样的文武官员来担保呢？后来新会县政府教育部门，改为由校长或主任和教师三人联名担保才能充当教师。（闻是中共地下组织设法提议改变的，）教师才松了一口气。

四八年五六月间，“新会县戡乱建国委员会”召开会城地区中小学校长主任座谈会，参议长黄槐庭在会上大声叫嚷说：“凡是青年教师，不嫌薪水低，工作积极肯干的要注意他的思想行动，有情况及时报告，否则后果由校长主任负责”（大意如此）、真是危言耸听。进步青年教师常以日间饮茶、夜间打麻将的腐化生活来掩盖刑警人员的耳目（刑警

是县府的公开的特务组织，这班人屁股后面枪尾突出，胸前卸开衫纽，凶神恶煞，受县长直接指挥）。

四九年五六月间，新会桐井乡小学校长梁衍文，青年教师李尧被刑警以莫须有的“通匪”罪名被抓走。不久又传一中、三中有些师生投奔解放区的消息，教师处于白色恐怖下生活，老教师鲁家铨要找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秘书林瑞尧担保，才能继续留在外海任教，四九年七月间，作者接受平山学校聘书不久，当时新会县长张寿对平山校长李钦说：“李达生此人有关匪嫌疑，不能聘用”。后经过《民权报》总编辑施见三讲情，广东省参议员许约之的担保，弄得亲笔信给平山校长证明，才免遭危险，离开学时间只差几天了。

四、团结起来迎接解放——会城小教 联谊会成立前后

解放前新会有教育会的组织，但根本不代表教师们的利益，而是国民党和政府的御用团体。抗战胜利后，教育会举行过一次教育会议，那是为了选出教育界的县参议员。参加的教师是先由国民党圈定的几个人，会议期间以请吃饭、饮茶为手段，公开拉选票，最后选出曾任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书记长、三青团新会分团筹备主任并任新会一二中校长的赵鼎勋来充当（后来当上付参议长）。会城的教师参加选举的人很少，因大多数都不是会员、作者有十多年的教龄，且领有甲种公职人员登记证，还取不到教育会员的资格。

这位从教育界选出来的付参议长，几年来没有为教师做件好事，教师被欠薪威胁到生活这重大问题，也没有代表教师们讲过一句话，提出合理的要求。当了官做老爷，怎还想到教师生活的苦况呢？

社会的现实生活，擦亮教师们的眼睛，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派的真面目，新会地下党组织，针对当时教师的思想情况，为了提高教师们的思想觉悟，认识生活及出路只有依靠自己，团结起来才有力量，通过葵风小学为基地，把附近私立小学如文懿，象泉，平山，侨光等校教师串联发动，进行每月一次轮回参观访问叙餐联欢等活动，把会城绝大部份私立小学教师团结起来，打破过去文人相轻，同行相妒，互不往来的局面，出现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气象。一些教育界老前辈李钦，莫荣坊，李子韶等人，也和教师们一起参观活动；队伍逐渐壮大，都认为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。四七年教师节的一次联合叙餐活动中，有69人参加，除会城私立小学教师外，还有外海五昌等校教师。来宾中有县教育科长赵梅友（中共党员）、督学汤梦畴。陈仲衡，何达云也以葵风校董名誉参加、连没有邀请的国民党新会县部常务监察委员区澧泉也来参加（来意不明）在庆祝会上通过成立会城小学教师联谊会筹备委员会（简称小教会）。选出平山校长李钦为筹委会主任委员，委员有陈东（葵风），李达生（文懿），陈如松（象泉）、陈柏坚（侨光）莫荣坊（崇真）等人，会址附设在平山小学内。选举前区澧泉站起来发言，讲一番支持组织小教会的道理，并说千万不要选我的话，当时教师议论纷纷，说这是毛遂自荐。后来有不少人投他一票而当选。

筹委会开过几次会，讨论组织章程，并向新会县府办理申请备案手续，李钦校长为小教会的事付出不少时间及精力、四八年一月四日，在平山小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、开会99人，外海，崖西等地都有教师参加，通过章程及入选名单，仪式隆重、并在一中后楼拍照留念。

可是小教联谊会成立一年多时间，经过三位县长——由

汤灿华、李务滋到张寿，都没有得到正式批准，只说新会有教育会的组织，不应再组织小教会，但也没有明令取缔。小教会的活动一直到解放。

四九年四月间，解放大军南下，南京、上海相继解放，新会处于黎明前夕，在白色恐怖，特务横行期间，中共新会地下组织出版的小型宣传刊物《新锋》，经常通过邮局寄到各学校，教师们秘密地互相传阅，对形势有所认识，对前途也充满信心，大家私下谈话中都渴望新会早日解放。

四九年十月，中共新会地下组织通过解放同盟做好迎接解放新会的工作，小教会部份人员集中到侨光小学，在夜间赶写标语，缝制五星红旗等工作。

四九年十月廿二日清晨，鲜艳的五星红旗先后在葵风、平山等校升起，接着大新路新新茶楼和百吉鞋店，长安药店、文明书局等商店都悬挂起五星红旗，同时主要街道出现署名解放同盟的庆祝新会解放的标语、一夜之间，会城换了人间，路上行人都以惊奇喜悦的心情，迎来会城新时代的来临。傍晚小教会大批教师集中在知政南路口，手执红旗，燃放鞭炮，高呼口号，热烈欢迎中共新会武装新生连部队由江门乘卡车开进会城。

这时，小教会成员，仍坚持教学工作，还抽出人力进行劳军，支前，宣传等工作，各校师生组织晨呼夜喊队，分区分片早晚在大街小巷巡回高呼口号鼓舞人心，会城小学教师 and 各界人士一样，为迎接会城解放，巩固民主政权出过不少力量。

四九年寒假，江会军管会在江门缅香中学（现紫茶小学），举行小教冬学班，会城小教会骨干成员大都参加，初步接受革命理论学习，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，新会县民主教师联合会，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，参加的有中小学教师121人，接着会城教联会及各区教联会相继成立，领导着县和区镇教师进行理论学习，思想改造，参加各项政治活动，会城小学教师联谊会胜利地完成历史任务。

抗战前后的新会县民众教育馆

何 季 铨

一九三二年，广东教育厅为培养民众教育专业人材，举办广东省民众教育人员训练所，训练期限一年，办了两届，招生简章声明毕业后由教育厅分配原籍任民众教育馆长或图书馆长。我考上第二届于一九三四年秋毕业，持省教育厅的分配“指令”返新会去见县教育局局长陈恒业，陈推说：“我这个局长有职无权，你可直接问县长。”我转而找县长黄槐庭，黄避不见面，只派一代表答复说：“新会景堂图书馆是私立的，县府无权委派馆长，县立民教馆馆长是县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任的，目前不能给你安置。”黄槐庭是当时统治广东的陈济棠手下文胆林翼中的宠儿，自恃后台硬，不把省教育厅的“指令”放在眼内；且不久，厅长谢瀛洲调任省高等法院院长，新任厅长黄麟书不管前任之事，不肯督促新会县府执行“指令”，故我往返江、省多次要求依章分派工作都没有结果，变成“毕业即失业”。

在我返邑交涉分派工作期间，考察新会办了哪些民众教育事业及其概况，写了一篇通讯稿《新会县民众教育馆巡礼》，于一九三四年底刊载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编印的《广东省民众教育月刊》上，指出：新会本是一等县，自古文风甚盛，乃是文物之邦，人才辈出，但现时教育事业反而十分落后，尤其民众教育事业更加贫乏，除了私人办的江门电影院、江

门戏院、会城戏院各一间及景堂图书馆在全省中可列入第一流外，公立的只有一个运动场（冯平山出资建）和一间民众教育馆，但这间民众教育馆有名无实，该馆设在会城国邑书院前座的一角，面积仅约三十来平方米，每月经费只有一百元，有馆长而无馆员，只雇一个“杂差”看管，馆内摆设为数不多的书籍及几份报纸杂志，我在该馆停留三个钟头阅书，见该馆真是门堪罗雀，到来阅览的不足十人，亦未闻该馆平时举办过任何应办的教育活动，只可勉强称为阅书报社而不应该挂“新会县立民众教育馆”的招牌。

这篇稿纸是用“江殿庐”的笔名，我不敢出真名是怕黄槐庭看了会报复打击。果然，通讯稿发表后，黄十分恼羞，一九三五年春派县府秘书张宝荣到广东省民教馆联系追查投稿人，遭月刊编辑拒绝。

一九三四年春，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建成开放（位于广州解放北路，即今之广东迎宾馆大院内），谢瀛洲自兼馆长，副馆长为省教育厅第四科长雷鸿坤兼任。经过一年举办过各种展览会、演讲会、音乐会、比赛会、话剧、粤剧、京剧公演等活动，江亢虎、谢瀛洲也曾在该馆大礼堂讲过学，张宝荣奉命赴穗追查投稿人时参观该馆，返县府复命顺便向黄介绍省民教馆的各项设施内容和活动情况，黄是爱出风头之人，以为也可以象谢瀛洲那样借民教馆的场地来表现一下自己的“才华”，兼之省民教馆刊物揭露新会县当局不重视发展民教事业，亦有必要设法补救以挽回面子，因而接受张宝荣的建议，同意拨款扩建县立民教馆，更名为新会县立第一民众教育馆，以示将来还会开设第二、第三间民教馆之意；张宝荣乘机树立自己势力，推荐当时在县立一中教务主任的叶耀衡当馆长。

这里顺笔一提，与此同时张还分别推荐何国琮继黄敏之任县立一中校长、叶恭信任县立冈州中学校长；两叶一何均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毕业，是张的新会一中旧同学，但冈州中学校友及学生多数自发地反对叶恭信接任，实行罢课，要求县府收回成命，让德高望重的李淡愚先生继续长校，学潮闹了多天，街头有海报、报纸也竞相报道学潮新闻，搞得黄槐庭、张宝荣、叶恭信等狼狈不堪，十分被动，最后，还是赖李淡愚先生劝导学生以学业为重，恢复上课，叶恭信才得勉强到校履新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叶耀衡受委后，首先与县府商定民教馆经费是每月省毫券一千元，馆址仍设在会城闾邑书院原址，但扩大面积范围包括正座头进二进全部及偏间，其次是组织班子，张宝荣指定要聘广东国民大学法律系刚毕业的李鹤年、罗荣恩两人为馆员，因张宝荣认为自己只是中学毕业，要升官就非得设法弄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不可，因此报名读广东国民大学，请李、罗二人在广州上课时代他签到，故叫叶聘李、罗任馆员以示酬劳；张还荐一中毕业的旧同学邝其焕任馆员；教育局长陈恒业（云楣）也指定要聘其侄陈子垣及女婿张其光两人为干事，张其光在广州读大学，住在广州，不可能天天来会城民教馆上班，只每月从省城返乡一次领乾薪四十元，我不懂其中奥妙，总觉得不顺眼，有人暗中劝告我：“军队和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团体吃空额的现象多了，何必大惊小怪，你还是以少管闲事为佳。”在旧社会，教育经费已经少得可怜，再加上当权人物安插私人，滥竽充数，甚至竟出现吃空额，又怎能办得好教育事业呢？叶自己也任用三个干事，一个是原在县一中任教务员的刘侠云，负责写美术字，宣传画和抄录，一个是李××（县一中初中毕